



走上农村

本社选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走上農村

本社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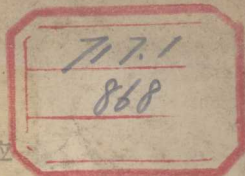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十一篇文章，都是描写干部和青年学生，响应党的“上山下乡”的号召，到农业生产战线上去的故事。其中“白县长还乡办社”、“徐一真和他的家乡”，表现了干部能上能下、既能做干部又能做农民的政治品质；“迈第一步”表达了干部被批准下乡后的愉快心情；“从立志做‘法官’到下乡当农民”，写一个高中毕业的女青年干部思想转变的过程；“我在农村有了亲人，有了家”、“怪不得这样轻”、“学扶犁”描写干部下乡后、在劳动锻炼中的体会以及和农民相结合的事例。

本書所选文章，简明具体，真实、生动，适合干部、学生、知识分子和广大群众阅读。



走 上 农 村

本 社 选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保定市裕华东路）

河北省書刊營業許可証第三号

河北人民印刷厂印刷

新华書店河北分店发行



1958年5月第一版 1958年5月第一次印刷

787×1092 1/32 · 1 1/2 印張 · 27,000字

印数：1—7,000册 定价：(6) 0.13元

統一書号：T10086 · 117

目 錄

迈第一步.....	1
徐一真和他的家乡.....	4
白县长还乡办社.....	9
从立志做“法官”到下乡当农民.....	15
新生活的开端.....	21
我在农村有了亲人，有了家.....	24
跟爸爸学当饲养員.....	26
劳动的第一課.....	30
学扶犁.....	32
怪不得这样輕.....	33
理想.....	35

迈 第 一 步

——側記一对夫妇到劳动中去之前——

叶 榛

田声远和潘秀珍是一对青年夫妇，声远是共青团唐山市委会的干事，秀珍是市郊区团委会的秘书。前些日子，他俩看了团中央“关于分期分批組織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决定”后，都暗暗作了个人的打算，向本单位領導上写了要求到劳动中去的申請書。

在一个周末，团市委正式通知田声远，已經接受了他要求第一批去参加体力劳动的申請。下班后，声远收拾了下办公桌上的东西就找秀珍去了。可是他又想：秀珍听了会高兴嗎？見面以后，声远首先試探地說：“这些日子要求到工厂、农村去的人可不少哇！”

秀珍笑盈盈地应了声：“我們这兒也都申請了，估計領導上会批准我去。我从来没有干过体力活，太該去了。……你們那兒怎样？”

声远沒等秀珍的話音落下，就插嘴說：“我已經被批准了！”秀珍一听更高兴了，一边为他祝賀，一边說：“太好了！咱們俩爭取要一块到劳动中去。”

几天后，秀珍的申請果然也被領導上批准了。

声远見夫妇俩都批准了，一天他在回家的路上自言自語說：“当五、六年干部了，又去参加劳动，还是夫妇俩都去，家里人会怎样看法？”

“如若不通，还得解釋唄！”

声远不知不觉的迈进了家里的大門。正巧，他的父亲和家里的人們都在家，他就直接說出了这件事。剛提开头，他的父亲——一位老矿工說：“好！年青的人需要鍛炼鍛炼。”并一再囑咐他“不受苦中苦，难得甜上甜。”接着，就送給他一套結实的窖衣（矿工工作服），告訴他在劳动时穿上，最好不过了。

这天，他家里格外熱鬧，特地給声远做了一頓好飯吃。

声远暗想：在今天的社会里，劳动是光荣豪迈的事业，已經不是被人看不起的事情了。

团市委通知他們，是到唐山市四十里以外的双庙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当社員。

几天来他們为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作打算了。想到这，想到那，一会哈哈大笑，一会又爭論不休。

吃飯怎么办呢？秀珍說：“为了不給农民添麻煩，还是自己做，以后連穿的衣服鞋等都要自己做，当一个样样都会的农民。”声远不同意自己做飯，他說：“不做飯，可以多参加田間劳动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那太好了。”……他們各說各的理由，最后的結論还是到村里以后根据情况再确定，能与农民搭伙，就与农民搭伙。同时他俩还决定到农业社后，每天早早地起来先去拾一趟糞，然后看看書报就下地生产。

行装怎样带呢？原打算是雇輛車都拉去。后来一想，还是用自行車自己推着一些，背着一些，就行了。用包袱包着衣服，带着被褥。另外还带着从家里要来的一盞煤油灯、一

个鉄皮暖壺，原放进包裹里，又拿出来了，他們都觉着农村里使用这样暖壺的还不多。

他們这样做，不是为了給誰“看”，也不是要“装扮”什么，他們是要尽量处处和农民一样，便于和农民很快地打成一片。

他俩在整装时，最感觉滿意的是每人有一个又厚又結实的馬糞紙夾子。他們以为有了它，到什么地方都有“書桌”了。

人們看了他們的行装，都說“真象安家落戶的样子。”

十月三十一日，就是他俩“乔迁之喜”的日子了。在这临行的前夕，他們又接見了来訪的記者。

声远和秀珍几天来，象接見他們的朋友和同学一样，热情地叙述着他們迫切需要到劳动中去的心情，并举出一桩桩事实。

声远說：“过去一到下边去，总‘抓’不到什么；不象工人、农民出身的干部，一說話就和人家說的那样亲密；我也和这些干部学过，仍轉不过来。”“原觉着写些东西还可以，誰知道一走出办公室，到基层里去总结一个团员的模范事迹，就发愁了。”秀珍也举出不少例子，証实她到劳动中去锻炼，对改造思想是有帮助的。

說一陣子笑一陣子。他們表示遺憾的是不能参加机关里的整风运动了。可是，他們又說：到农村去参加大辯論，同样能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。

……

他們送出我来的时候，我祝賀他們在劳动中迅速成长！

（原載1957年11月“河北日报”）

徐一真和他的家乡

燃 天

深县城东四十里，靠近滄石路南側，有个六百来户的村庄，一条小河横穿过街心，河边、村旁杂树成丛，这便是徐祥口村——徐一真同志的家乡。

徐一真是深县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員。他从开始脱离生产参加革命到现在，已有十多年了。前些日子，党提出了到农村中去、到劳动战线上去的号召，很快地在他的心里引起了共鸣。正好，在这时徐祥口村的村干部們，給县里写来了要求批准徐一真返乡生产的申請書。徐一真毫不犹豫地提出了退职的請求，經組織批准，抱着建設美好农村的理想，返回了家乡。

支配徐一真返乡的东西，并不是人們常說的“乡土观念”，而是出于对党的事业和对家乡的热爱交織在一起的思想情感。

家乡，对于徐一真來說，在很长时间是与他自己的成长血肉相連的。早在一九三九年抗日战争时期，徐一真便在家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不久，便担任了村党支部書記、青救会主任。那时他才十八岁，年老些的村干部，都亲昵地称呼他“小小”，他在人們面前是孩子，但又是掌握全盘工作的領導者。村子紧靠敌人的炮楼和滄石公路，斗争形势十分尖锐。徐一真經常帶領一群青壮年小伙子出击、破路、割电线，还要安排、布置党的日常工作。那时，这村的工作很活跃，称得起是敌人脚下的抗日模范村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他和

乡亲们一起动手保卫着家乡，家乡的对敌斗争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斗争，也给了他实际锻炼，使他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党员。

徐一真脱离生产第一次离开家乡是在一九四四年。他曾深入到敌占区做过党的地下工作，曾在环境极端残酷的涿良宛地区任过区抗联会主任，出没在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壕沟、碉堡之间，领导当地农民进行反奸复仇，组织小型的武装斗争。紧张的战斗生活，沉重的工作担子，累得他吐了血，才回到家乡休养。病刚痊愈，又重新在村里担任了党支部书记，直到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，徐一真才又离家回到革命队伍。全村每个人的脾气徐一真都了解，每个乡亲也都了解徐一真的心。徐一真的感情在家乡的土地上扎了根；这种联系到什么时候也割不断、忘不掉。

徐一真对革命工作的火热情，说干就干而又细心谨慎的作风，至今在村干部们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现在的村党支部书记徐朋荅、副书记张多臣、农业社副主任刘金才等，都是徐一真当年的老战友。他们在一起紧张工作的情景，胜利完成工作后的乐趣，至今大家都津津乐道，只要坐在一起，说起来没个头儿。那时，干部们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，村里的工作一推百动，只要说开会，不论白天黑夜，立刻聚齐；各种工作从没有落在别村的后头。有些干部回忆起这些，再看看今天村里工作落后了，常常焦虑地说一声：什么时候咱村的工作能象早先那样活跃！徐一真如果在村里够多好……

村干部们这次写给县里的申请书，正道出了人们长久以来的愿望。家乡的期望象一股暖流那样，温暖着徐一真的心。他返乡建设家乡的要求更强烈了，这种要求很自然地

党的号召融汇在一起。

徐一真在打定主意回家之前，有这样一个顾虑，他想：自己和村干部、乡亲们都是十成感情，农村工作也较熟悉，这是有利条件；只是村中的工作状况不比从前，扎手的问题少不了，唯恐费一股子劲工作做不好……。可是，他立刻又想到：正是这样，才更需要自己去“拉一把”呀，这个责任是不能推卸的。

九月二十二日，徐一真回到了家乡。令人高兴的消息很快地传遍全村。农业社社员孙文瑞说：“老书记又回来了，人家革命多年，知道的事情多，到村后准能给我们多办好事。”他回到家来正赶上村里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，一天没隔，徐一真便分工整理社员“鸣放”意见，一起和村干部做研究，推动大辩论迅速展开。

徐一真在进村之前就有打算，这便是首先注意搞好村党支部的团结。经过好些天的了解分析，他认识到有些干部有隔膜，主要是由于支部没有经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制度；干部们的心里话摆不到桌面上，因而互相猜疑、不满；再就是因为支部没有树立起集体统一的领导，支部委员多是看问题从本街本片着眼，闹本位，不顾全局，甚至遇事各自作主，各干各的，互不支持、帮助，闹不团结。因此，徐一真向党支部书记徐朋荅建议：把党内组织生活健全起来，开好以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内容的支部委员会。

徐一真的建议提醒了徐朋荅。从此支委会形成了制度，并决议：今后一些重要问题必须经过支委会讨论作出决议，然后执行。这样既便于实现集体领导，又可及时解决问題，消除彼此的疑虑。党员武发起说：“一真一回来，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，工作跟的紧了，眼看着步步上升。”

徐一真当过区抗联主任、副区长、檢察員，前后經過十多年，可是，应当怎样当农民，当村干部，他并没有忘記。他一进家就脫去了“干部服”，上身是家做的黑色对襟棉袄，下身是半新半旧的褲子，头上包扎一条毛巾，站到农民中間，滿“入群”。他对我說：“在农村里不能穿好衣服，鬧排場，如果自家比別人‘高一头’，到这家去嫌不干淨，到那家去不敢落坐，怕脏衣服，必然脫离群众。”

在农村做工作，是和农民直接打交道，事事要坚持說服教育的方法，通过提高群众觉悟实现党的各項任务，徐一真一回乡就牢牢記住了这一点。他經常告訴村干部，經常注意用說服教育方法，对群众做好思想工作，事情就好办了。

在整个村子里，一真沒有碰对头不說話的人。比自己年紀大的人，长自己一辈，見面就呼叔叔、称伯伯。同他年岁差不多的人，还是和过去一样張口和他开玩笑，逗个嘴。这个村里农民有个习惯，往往彼此見面先摸衣袋，問一声“有烟么？”有，就掏一袋。这个习惯一真并没忘掉，不論什么場合，碰到合适的对象，就笑咪咪地摸对方的口袋：“掏一袋！”如果对方表面拒絕，少不得又有一番玩笑、打鬧。

一真常对人講：当村干部有两条原則很重要，一是大公无私，一是以身作則。这两条兌現了，教育群众好开口，也可以使人信服，工作就能順利完成。回到村里，他正是这样做的。尽管晚間工作到深夜，他总是天剛亮就起身，下地澆园，推碾子，以及家中的零碎活，动手就干。他的家中前两个月因来客人亏了吃粮，他下决心后两个月吃些代食品，节省出粮食来补亏缺，不向国家多購吃粮。無論白天多么劳累，夜晚村里开会一次也不肯缺席。

徐一真同志不知道我过去是否做过农村工作，一天，他

向我說：“农村工作可真有意思，你說是不是？”

我故意問他：“意思在哪里？”

“有希望，有奔头，就有意思。我回乡的目的是建設好幸福的农村，現在正一步一步地向这个目标迈进，每次做好一項工作，都觉得是走近目标一步，这里，自然就有了兴趣……”接着他又向我談到家乡今年水利建設投資一万二千元的设计，談到决心在近二年把村里的工作整頓好，还要培养青年一代成为建設农村的生力軍。他兴致勃勃地談着，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閃爍着幸运的光芒。党的建設社会主义农村的宏偉计划，使他看到了美好的未来，鼓舞他愉快地担起了党给予的光荣責任。

我一面听着，一面微笑着連連点头，从他的話中我受到了教育。

我想，党多次向我們講过：爱家乡、爱人民和爱党，这三者是一致的，統一的，問題在于如何将这些很好地結合起来。徐一真同志在这方面做得好。当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，他可以毫不犹豫地离开可爱的家乡，到緊張的战斗崗位上去发动群众，抗击敌人；当党迫切需要干部人材建設新农村的时候，徐一真又毅然响应党的号召，和家乡父老一起去建設美好的生活。他的行为滿足了家乡对他的要求和期望，也表現了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誠。

（原載1957年12月26日“河北日报”）

白县长还乡办社

胡玉泉

你来了解方玉哥回家生产办社的情况嗎？真太湊巧了，我們早就发愁，滄县白賈村就缺少个能动笔墨的人，要不，我們早就把他的事迹写給报社了。

說起今天白賈村社員們的幸福生活，就想起方玉哥回家办社的情景。去年3月17日那天，全村男女老幼，象流水似的涌向通往官亭乡的路上，欢迎方玉哥光荣返乡。

方玉哥是河北省故城县的副县长。他来了，沒有騎馬，也沒有坐轎，随随便便与县区的几位同志坐在一輛胶輪大車上。車上，載着他那简单朴素的行装。他披着一件旧大衣，見了我們，就高兴地跳下来和我們握手。我們感动地說：“方玉哥真是個‘能上能下’的好黨員！”

还是十二年前的秋天，正在战争时期，我們的根据地一天比一天扩大，党为了开展工作，号召农村黨員走上工作崗位。那时方玉嫂生孩子剛滿月，他就毅然离开了家，到区上工作。今天全国到处是一片和平建設景象，农村基层組織迫切需要有文化、有能力的領導骨干的时候，他又带头响应党的号召，回家生产办社。

他回到家，社員們一致选他当社主任，从那时起我們的农业社就变了样。他回来的时候，社里有一部分富裕中农正在带头掀起了一股退社和散社的逆流。方玉哥看見这种情况，認為搞好社，必須全党动手。所以，一天晚上，召开了全体黨員會議，討論和端正黨員对合作化应抱的态度。會議

开始，方玉哥首先講了話，他說明了共產黨員在困難面前应当怎樣辦？接着分析和總結办好咱們社的有利條件。最后他特別強調說：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貧農和中農都是贊成和擁護社會主義道路的，他們是我們的靠山，只要我們黨員帶頭行動起來，堅決地貫徹和執行黨的階級路線，散沙也能和成泥蓋起樓房！”

接着，方玉哥幫助我們總結了1956年辦社的生產成績：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社員都增加了收入，有一部分不增不減，而減少收入的只是那些對社“三心二意”、干起活來“三天打魚，兩天晒網”的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富裕中農。經方玉哥這樣總結分析，黨員們都有了底，對群眾宣傳就更有理由了。在社員大會上，方玉哥又表揚了一貫生產積極、愛社如家的貧農和下中農社員，肯定了去年辦社的成績；同時也批判了那些資本主義思想嚴重的富裕中農。這樣，社里的空氣就大大不同了。

方玉哥在工作上有這樣的特点：當干部被工作苦惱住了，他總是說這是有利條件，那是有利條件；當干部感到工作一帆風順的時候，他又總是說這是困難，那是困難。使人總是不松勁、不驕傲、兢兢業業地去工作。

他回到家，就摘了手表，脫了干部服，穿戴得跟“庄稼佬”一樣，不論什麼脏活、累活他都下手干。春天，小麥需要加強管理，他曾手提着屎罐子和人們一道去澆稀。夏天，麥收時，他冒着火辣的太陽和人們一道去割麥。他通過參加生產，發現了社內許多問題，解決了許多問題。例如，他春天在田間干活，訪問了一些退社戶和中農社員，那些人都向他吐出了真心話，綜合起來他們對社有三點不滿：一、棗樹全部歸社；二、賬目沒有按期公開；三、超額投資沒有按社章

規定償還。他這些問題，拿到社委會上和大家共同研究，大家一致認為這些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，不只是退社戶和中農，貧農和下中農也有這樣的意見。於是決定立即採取措施進行解決。經過社員代表會議討論通過，全社三百五十六畝棗樹，一律改為“三(社)七(社員)分紅制”，棗樹歸原主經營管理，三年後再歸社所有。賬目問題，立即責成會計，進行了結算清理，並在社員代表會上逐條逐款作了交代。這樣做的結果，中貧農社員都滿意，富裕中農散佈的“合作化餓死幹部餓死牛”的反動言論不攻自破。社員們反映：“合作社攤子大，開支多，但收入支出都是一卯對一星，當幹部真是不容易啊！”中貧農社員生產情緒進一步高漲起來。原來有的隊社員把牲口都牽回家去了，現在都主動地送了回來。有些社員把留出上自留地的糞肥，積極投資到社里。

但是，歸還超額投資問題，方玉哥卻發了愁。1956年秋收分配時，強調了“少扣多分”，沒有扣除償還投資部分。糧款都分配給社員了，不還吧，確實不合乎社章的規定，因為上面明明寫着投資要在五年內逐步還清。這樣計算起來，大體每年需要償還二千元到三千元。還吧，當時正处在青黃不接的時期，同時社內又沒有存款。怎麼辦呢？經方玉哥提議，決定把投資在一百元以上的戶都請來，把困難和章程拿出來，交給大家辯論解決。

第二天晚上，大家都來了，共計四十二戶，淨是些入驢子和大車的富裕中農戶。

方玉哥向大家說明這個會議的目的，並表明態度：社委會同情大家的要求，因為去年應當償還的投資，直拖到現在不聲不響，是不對的。最後方玉哥說：“1956年雖然我們村的絕大多數貧農和下中農社員，都增加收入，但比較起來他

們的生活還比我們困難的多，辦合作社要有共同富裕的思想，所以社的‘超額投資’去年沒扣，今年也就不能再向外退了。現在，既然大家要求償還投資，也就不得不想個特殊的辦法，社委會開了多少次會研究，感到就只有這麼一條道：就是從咱們現有的驢子中，挑選三四好的把它賣掉，換成三四馬，這樣能騰出二千元償還投資。說實在的，論干活三四馬也不頂一匹驢子，但是處在這種情況下，只好咬着牙這樣干！”

償還投資的方案一公布，人們展開了熱烈的辯論。

“我的情況與別人說的不同！”一個過去常在集市上搗騰牲口、說話辦事都奸滑、外號叫“花長虫”的富裕中農白汝江說話了。“我入社時，欠下一、二百塊錢的賬，我要求把我那頭驢子允許我牽出去賣掉，我好把賬還上，剩下的錢買了驢入社！”

但是，他的“鬼八卦”立即遭到人們的反駁。六十多歲的白方越大聲說：“咱們高級化才一年，誰家沒有點難處，咱們社的牲口這樣少，還追着社還投資要驢子，驢子就是咱們大家的翎毛啊！”“對！咱們今年社內增產不增產還仗着這幾匹圓蹄的牲口呢！”一向沉默寡言的白方繼也答了腔：

“社里沒有我入的驢子，但是有我入的大車，照汝江你的說法我得把大車架出來賣了換輛小車入社，那咱社不垮了嗎？”白方亭說的更干脆：“咱們村從老輩子就都喜愛驢子，它干起活來力氣沒有個完，又皮實又潑辣，方玉剛才說的賣驢子，純粹是沒有辦法的辦法，我家庭也有困難，但我能緊緊褲腰帶過去，賣驢子錢我分文不要！”

經過一場激烈的爭辯，結果同意賣驢子的只是個別人。

方玉哥代表社委會表示態度：要照大家的意見去辦。去年沒

还的超额投资挪到麦收后偿还，确实生活困难的，社也要帮助解决。同时，对大家这种集体主义精神进行了表扬。

散会后，我和方玉哥都愉快地笑了，深深感到有困难和群众商量，没有过不去的“火焰山”。同时这次会议，也使我們进一步了解絕大多数中农的心愿：他們是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。

說实在的，方玉哥回到家来，真比他过去当县长还劳累。晚上开会解决社内問題，經常鬧到深夜，但早晨他还起得挺早，到場里轉轉，到牲口棚看看；粪筐子不离身，有时赶上沒背粪筐子，在路上看見牲口粪，他就用脚踢到地里。社員們經常夸奖他：“看人家县长回到家，真是个当家过日子的来头！”他常跑区跑乡的开会，从沒有摆过架子，鬧过闊气，赶上有車子，就騎車子，沒有車子就用腿“顛”，估計半天回不来，口袋里装上个凉餅子。

他对待党的任务，严肃認真，实事求是。今年五月初，县委布置加强小麦管理，多施粪肥，乡分配給我們社的任务是五百亩，当时方玉哥和我們算了下賬，完成这任务，得粪肥十五万斤，把全村的厕所、牛棚翻过底来也完不成。最后我們决定，要下最大决心搞，提出“能澆一亩是一亩，能澆一分是一分”的口号。我到乡里去汇报时，因为邻村的社都汇报完成了几百亩，我們的进度只几十亩，我們受了批評。同时邻村个别社干部冷嘲热諷地說：“你們村有駐社县长，澆稀这么个小工作还成問題！”我憋了一肚子气，回村时特地到邻村社澆过稀的麦地里去看了下，啊！澆的什么稀！粪很少，簡直和澆清水一样，这一下我更火了，回到村沒进家，就去找方玉哥。一見面我气囊囊地說：“乡里再通知汇报澆稀你去吧！”他問“为什么？”我說：“数字报少